

黔东南州苗学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

论文集

黔东南州苗学研究会 编

一九九六年二月

黔东南州苗学研究会首届学术会

论文集

黔东南州苗学会 编

黔东南州苗学研究会首届学术会论文集

目 录

关于陈靖同志致呈李瑞环主席的信论及苗族问题的

意见报告.....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

陈靖将军致李瑞环主席的信..... 陈 靖(8)

只有尊重历史和认识历史才能增强苗族人民的自尊心、

自信心和凝聚力..... 张明达、李正品(17)

民族地区法制宣传教育方法探讨 陈代清(32)

略议苗族妇女的历史地位 阿 彩(40)

论苗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意识落后、缺乏凝聚力”的

内部原因(节选) 唐千文(42)

试论黔东南民族经济发展的优势与劣势问题 ... 曾祥慧(45)

论苗族服饰的开发(内容提要) 罗义群(65)

黔东南民间造纸及其对苗族生活的影响 田 军(67)

敞开山门,步入世界经济潮流..... 吴国伦(74)

浅谈苗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思路 金振华(84)

台江苗族刺绣与个体经济的发展 曾祥麟(89)

浅谈草药在民族地区的应用 范述波(94)

从科技文化看苗乡经济(提纲)	潘世仁(97)
月亮山苗族传统文化开发的现实意义	余 涛(99)
浅谈黔东南苗族地区资源综合开发的	
总体思路	吴清德(103)
试论黔东南苗族图腾问题	雷秀武(109)
浅谈妇女解放运动对苗族传统家庭文化的	
冲击和影响	潘文兰、潘燕(128)
都柳江苗族试探(节选)	普 虹(134)
原始宗教的活化石——苗族“喊禾魂”	万必轩(141)
抽象词语是苗语发展的方向	潘兴超(145)
黄平苗族理词刍论	杨 德(155)
试论黔东南州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	黄国才(161)
我州广播电视文艺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吴定文(166)
黔东南方言在学校教学中的负面影响	王贵生(169)
五百二十年的凯里城变迁(内容提要)	顾永昌(179)
论张秀眉起义中三穗寨头保卫战的	
历史地位	吴展明(182)
颂——献给黔东南州苗学会成立盛典	阿 彩(191)
足迹——献给我的苗族同胞们	阿 彩(193)
(18) 李 金	
(18) 杨 金	
(18) 金 金	

按：这封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收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转去的陈靖同志致李瑞环主席的信的答复意见抄件，我们在省苗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从陈靖同志处抄来，现印发给大家参阅。

州苗学会

一九九六年元月五日

关于陈靖同志致呈李瑞环主席的信论及苗族问题的意见报告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这封信的中心意思是陈述一个建议：为苗族的最高祖先——蚩尤平反正名。我们经过反复认真地阅读，并结合有关最新科研成果，认为这封信的目的有两个：一、完善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加强中华民族内聚力；二、加快和帮助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此而更正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民族观确定的关于蚩尤的结论。

对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答复：（一）学术上的意见；（二）民族政策与现实性；（三）国际性意义。

一、学术上的意见

我们认为，信中所述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有学术依据的，尽管个别地方和定性不确。

(一)历史记载中和传统看法上的蚩尤与事实上可能的情况

蚩尤,与黄帝、炎帝一样,是历史传说中几乎同时代的人物(炎帝可能稍早)。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蚩尤、黄帝、炎帝的文献记载都是先秦、秦汉时代甚至这以后对远古传说的记录。现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南、贵州等地民间也还流传着关于蚩尤与炎黄的传说。而且关于三者的记载和传说一般是不可分的,紧密相联的。

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无文字时代的历史,我们只有两个依据,一个是考古发掘,一个就是历史传说。传说证史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我国史学界一般都确认蚩尤炎黄时代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曾经存在。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各自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原始社会一章都有关于炎帝蚩尤的肯定性内容。

先秦秦汉时代各种历史文献对蚩尤的记述基本上大同小异。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黄帝)之时,神农氏(有人认为即炎帝)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史记》是我国正史“二十四史”之第一部,也是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黄帝与蚩尤二人及双方战争的存在。另一方面,这些文字是司马迁用那个时代(汉朝、封建社会早期)的眼光和头脑对当时传说的记载或对先秦遗籍的转用,其用词、表述和立场自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是站在正统王位的立场、站在黄帝后裔大华夏(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的记载,看不到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平等性和一体性。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司马迁,但我们现代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国家和人民应该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中原大地(黄河中下游)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并无所谓国家、诸侯、帝王之说,亦无所谓反叛、暴乱和征伐之义。当时亦尚未形成民族,不仅没有汉族、苗族,更不可能有中华民族。那是汉族、苗族等及中华民族发展的初始阶段。准确地说当时只是大小林立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及其头人、酋长或首领,它们之间经常发生各种冲突战争。这类冲突与我国近代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冤家、猎人头、掠土地相类似。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酋长、黄帝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之间的冲突征战是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大地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正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战争)促进了部落之间的交流、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认为,所有民族无论大小,语言、发展程度,都是平等的。不仅现代各民族如此,对于历史上的部落关系、民族关系也应该以民族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和认识。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也就是平等的。从现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来看,他们同是中华民族的两支主源;历史地看,他们之间并无谁是谁非、谁该赞颂传扬谁该否定诛伐的问题,他们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所谓“暴虐”、“作乱”、“征伐”是封建正统史观和汉族中心主义给予的定性,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种观点和态度一直作为该问题的主导看法在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流布,直至今日,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大多数国人知炎黄而不知有蚩尤,知蚩尤者中大多认为他只是一个被黄帝讨伐战败的叛乱者,一个暴虐之徒,甚至有人认为蚩尤是一个非人的怪物。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认识,需要通过完善民

族平等、落实民族政策、加强宣传和教育来确立蚩尤应有的地位和形象。

(二) 蚩尤与苗族的关系

黄帝与汉族的关系不言自明。蚩尤及其所属九黎部落与苗族的渊源关系,也已基本上被学术界所认定。

国内出版的关于苗族历史的两部权威著作,一是“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苗族简史》,龙伯亚、李廷贵等人组成编写组编著,1985年10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一是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作为该社“中国少数民族专史丛书”之一出版。

前书在第一章第一节(族源和族称)的第一句即写道:“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蚩尤即九黎部落的首领)、“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关系”。又说:“九黎、三苗、南蛮、荆蛮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且都包括苗族的先民。”

后书第一章(苗族的原始时代)第一节(传说中的苗族先民)直接以“苗族远祖蚩尤”作为第一个小标题,并以流传于汉族中的传说和汉族文献资料与苗族的古歌、传说和习俗互相印证。然后结论说:“传说时代的蚩尤九黎部落集团,就是后来苗族的最初先民,或至少是包括了苗族的先民。”

(三) 蚩尤作为中华民族先祖之一的地位

蚩尤不仅是苗族的祖先,他与黄帝、炎帝同是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上的三位著名始祖。

首先,从民族史学的角度来看,现在的苗族、瑶族、畲族、汉族等民族中不管是从血缘上还是文化上都有蚩尤九黎部落的遗传。蚩尤在涿鹿(在河北涿鹿一带)大战中被炎黄联盟击败后,他所统辖各部落,部分南迁江淮流域部分留居当地,改

属黄帝部落联盟区内的属民,这是最早加入华夏族群的非炎黄系成分;另有部分自涿鹿北迁,在春秋时代曾建立过黎国,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又融入一些北方民族之中。南迁各部落与江淮一些土著部落后来又组成三苗部落联盟(史称三苗国)结果又先后被黄河流域黄帝部落联盟的继承者尧、舜、禹击败。三苗西北部一部分发展为荆蛮,后建立了楚国,大部分分别向西、向南、向东南迁入山区,形成苗族、瑶族、畲族;另有一些又融入了华夏族群之中。华夏——汉民族就是以炎帝、黄帝部落联盟为核心,先后融入了九黎、东夷、北狄——匈奴、百越、鲜卑、契丹等族群或部落的成分而形成的。

体质人类学对人类群体遗传基因的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个结论。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杜若甫教授在她的《中国的民族》一书中根据对广东、广西、海南地区的调查研究指出:“汉族中至少有 70%至 80%不是汉族。”尽管她是针对华南地区来说,但这仍然能够表明,全国其他地方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情况。

别一方面,华夏——汉民族集团也不断有部分成员融入其他民族之中。

正是上述双向的长期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依共存关系,形成了中国各民族以汉族为核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种关系奠定了中华民族这个具有强大的内聚力的大家庭。(参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而这一切都是从黄帝——蚩尤开始的。如果要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这种格局的形成追溯一个起始的话,“炎帝—黄帝——蚩尤”三个首领虽然不是今天中国所有的民族的祖先,但是他们应该是可推最早的、明确而有代表性的、关

系密切而平等的三位一体的始祖体系。仅止炎黄是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始祖的。

二、民族政策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我国的民族政策都是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就从古代民族或部落意义的角度,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应该具有平等的历史地位。

从主体文化的传承和人体遗传基因的主源来看,如果说黄帝是汉族的始祖的话,则蚩尤是苗族的始祖也是证据充足的。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苗族古籍之五《板塘苗歌选》中的《相普相娘歌(祖先歌)》唱道:“我们苗族的祖先名叫蚩尤”。我国的民族政策之一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继续维持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蚩尤的不正确认识和不公正态度,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违背民族政策的。

我国现阶段正需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而苗族是广泛分布于我国中南、西南八省区的主要民族。不论是从我国现实发展的战略需要,还是从民族政策所强调的国家大力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角度,明确蚩尤在中国古史中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它对苗、瑶等民族具有加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振奋民族精神之功用,有利于苗、瑶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6页)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尤其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场合光提“炎黄子孙”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为它不能代表中华各民族。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三卷发现邓小平同志一般

都是用“中华民族”一词。而恢复和确立与炎黄平等的,与少数民族有关的蚩尤的历史地位,对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有巨大促进作用的。

三、国际意义

苗族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自明清以来,苗族不断从我国西南迁入东南亚各国,本世纪七十年代始又开始大批迁入西方各国。现在中国以外的苗族占苗族总人口已近三分之一(约百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德国、阿根廷、圭亚那、澳大利亚等五大洲十几个国家。他们正在形成一个苗族文化传布网和苗族力量网。而且,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根在中国。我们支持苗族树立蚩尤作为精神偶像和凝聚核心,对于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苗族都是一种号召力和凝聚力,这对于我们国家和苗族来说都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蚩尤是与炎帝、黄帝同时代的平等的部落酋长,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而不是汉族的角度,确认蚩尤与炎帝、黄帝同为中华远古三始祖,具有促进各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实意义。蚩尤部落与苗族、瑶族、畲族、汉族等许多民族都有关系,但相对地说与苗瑶民族的关系更紧密一些、更纯正一些,汉族既可崇祭黄帝,苗族人民以蚩尤作为民族始祖加以崇敬,并要求中央和国家的认可,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应该予以首肯的。这有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振奋。但是传统形成的关于蚩尤的不正确认识 and 歧视性看法,国家应该尽力予以消除,还蚩尤之本来面目,立我中国民族之始祖形象,促我中华民族之团结进步。

陈靖将军给李瑞环主席的信

陈靖

尊敬的李瑞环主席：

我是个苗裔红军老战士，离休后致力于长征史研究与民族问题探讨。近十年来多次重走长征路，行程十多万公里。在反复调查中，除写了百万字的文章外，也陆续向有关领导部门或领导同志（包括总政、国务院和人大廖汉生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及民政部老部长程子华同志等），作过口头或书面的汇报。最近（1993年底）还向军委江泽民主席、刘华清、张震副主席写过万言长信，反映“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情况”和“关于军队经商的危害与危险”的建议等，此刻向李主席写信，中心是呈述一个建议：为苗族的最高祖先——蚩尤平反正名。

蚩尤的后代——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特点突出的古老民族。她那勤劳苦奋、顽强不屈、憨厚善良、不欺不霸的特性，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不变，一贯数千年。苗族特别钟爱大自然。她对山水草木具有天生的感情，这也是她以“苗”字为本民族定名的原因之一。苗族还是创造和发展华夏南北文化（即黄河、长江文化）的主力军之一，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

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土地上，都有着苗族先民的累累足迹。然而，苗族又是一个屡遭不幸、总是战败、不断迁徙、一直在夹缝中受欺压而顽强生存下来的民族。她所受的苦难，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贯穿于三大社会——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在世界民族史上也是一大奇迹，令一些学者与专家惊叹和尊敬。故澳大利亚的史学家格迪斯，面对世界两千多个民族的兴衰与消亡而把苗族列在首位。他这样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民族，这就是中国的苗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不论从我国的钦定正史还是人民所写的野史，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代朝政几乎都是欺压和歧视蚩尤及其子孙的，从尧舜禹汤直到宋元明清。苗族几乎都是被欺被压、躲躲藏藏、在荒山野岭中求生存。直到最后一个王朝，苗族偷偷保存下来的文字（契形字），也被乾隆皇帝彻底禁绝了。进入中华民国的三十八年中，对待苗族不但没有什么改变，而且把苗族的鼻祖蚩尤，作为“异物”写入教科书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马克思主义光芒照射下，苗族同数十个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们一道，获得了破天荒的新生和解放。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大批被歪曲、被污蔑的历史人物，如“拳匪”、“闯贼”等得以恢复本来面目。但不知何故，就是不给蚩尤正名，使其永远被置于“另册”。三年前，一些汉族同志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国内外华裔同胞，给炎帝、黄帝塑铸纪念像。这本来是个很好的愿望，可是考虑不够全面，尤其是不能同正统思想脱勾，

实际上起了一种播下民族不和睦种子的负作用,滋生着民族离心力。有人提出补救办法,建议解放蚩尤,把“炎黄蚩”三兄长并提出来,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也体现了汉族老大哥的大度与胸襟,更是同中国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形成紧相吻合。但担负实际工作的同志不同意,不仅要在黄河岸上树立起世界的炎黄巨像,而且把数千年来一致公认、一贯下来的——黄帝、炎帝、蚩尤“三部落”说成“两大部落”;甚至还要进一步为那场兄弟相煎的原始大内战扬威显能;在打败蚩尤和驱赶苗族南下的涿鹿大地建造“炎黄城”,幸有涿鹿县的四大班子未予采纳,而是决定建造一个有助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力的包括蚩尤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团结遗址”。我以为涿鹿县的领导这一决策是有远见的,是实事求是的。以恩格斯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五千年发展史,真实情况应当是:蚩尤是苗族的鼻祖,同时也是汉族的祖先(从血缘关系看)。目前中国有12亿人,汉族一般说是10亿多,这并非是汉族特别善于繁殖,主要是历来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总是以汉族的胜利而告终,使许多战败民族被融合于汉族了,所以《中国的民族》(杜若甫)得出结论说:汉人其实70%至80%不是汉族、大部份汉人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能够彻底脱离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影响,离开正统观念的依钵,勇敢面对历史实际(不是仅翻钦定正史),全方位的看待中华民族的曲折发展史的话,“在70%至80%的非汉族的汉人中,苗族血缘的比重是不小的。一部“内战内行”的中华内战通史中,尽管一些大权威、大史学家绝对掌握

着修史权,然而也还不可能一掌遮天。苗族从奴隶社会的奴隶生存战、到封建社会的农民反抗战,总是失败。大量被俘虏之后,就慢慢的融合到汉村汉民中去了。一位苗族学者在研究民族关系中指出:现在我国是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国汉族”只是六十分之一,不是全部。其实不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炎黄蚩”是中华民族的“三先人”,这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可是有的汉族同胞就是不同意,要“研究研究”,要“待权威发话”,否则没有用。我这一年来,做了大量的“没有用”的调查研究,常常遇到这样的事,万千个人取得一致认识,但某个权威一句话就否定了,甚至铁定下来了。我访问不少“土学者”、“土作家”和年逾古稀的少数民族老人,人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和感叹:千研究,万调查,不如权威一句话。

中华民族是个诗史丰盛、经典多彩、正史野史俱全的民族集团,数千年来任其风云万变,而累累如山似海的著作中,对蚩尤及其子孙们的作用与地位,都有着朗朗记载。尽管百家各有所见,然而这样的事实是谁也不能抹掉的,即:蚩尤与黄帝、炎帝是平起平坐、鼎立黄河流域,创建中华文化的三先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三兄长。

苗族先民最早生息繁衍在今冀鲁豫平原这片土地上,即南起黄河、北至桑干河、东起渤海、西至汾水,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最早掌握种植技术。当黄帝、炎帝在黄河上游的黄土高原时,这些土地上就有的较精美的陶器和青铜器,故有的史家称苗人为河海民族,即站在最初文明前列的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就是蚩尤。以游牧为主的黄帝与炎帝部落,繁衍在黄河中上游。黄炎两部落逐渐东下,在互相冲突中又联手共同对抗蚩

尤,于是发生那场开天辟地的大内战——涿鹿之战,结果是以蚩尤被杀而告终。他的子子孙孙从此被驱赶而南渡黄河、开始踏上那条人类史上灾难连绵的古“长征”之路。用范文澜同志的话说:“黄炎两族,共同对抗强大的苗族,迫使苗族退向长江流域”。这个善于从事耕种的河海部落集团,被迫去到淮河与长江中下游落脚,从此,苗族由北方民族成为南方民族,她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开拓发展、共建南国文明。大约经过了九百年的努力,辽阔的长江中下游出现了一个被后人称为“三苗国”的局面。我们可以随便翻阅一下古史古书,便可以看到大量的明确记载:“三苗国,一日三毛国也”(《山海经、海外南经》);“今江州、鄂州、岳州、江西之地也”(《史记正义》);“今湖广武昌、岳州府、三苗之地也”(《尚书地理今释》);“柴桑彭泽之间,古三苗也”(《路史、国名记》);“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在江南荆州也”(《名义考》);“三苗不服者,衡山在南,岷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古彭蠡之水”(《韩非子》)……那么所谓“三苗不服”是怎么回事呢?历史的真实是:黄河集团发现蚩尤子孙们在南方兴旺发达起来,向南方发起进攻,争霸这片新兴土地。这时已进入奴隶社会,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奴隶主争夺战和奴隶反抗战延续开来,著名的“三苗”和“四凶”就出现在这个历史时期,这场斗争非常曲折,非常残酷,结果是尧舜禹汤胜利了,三苗四凶都是失败者。正统史家和权威们死抱着“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原则,不作全面记载,对蚩尤子孙们的反抗加以诬蔑,记下了“三苗作乱,负固不服,兴师问罪”条文,于是到处追杀“三苗”就有理了;对四凶则是以隔离流放,使其永远不得翻身。我们都知道,正统史家历史都是反对改革的,他们对待历史,是可以随意切割的,典型者恐怕是大史家、大权威、大

官僚司马文正公了。他为了维护正统主义，可以随便切割楚人屈原，司马光亲舞刀笔，不许屈原有片言只字留在《资治通鉴》上，在说这是由于他个人对楚人的厌恶，也有说是他对三苗的偏见所致。可见这位大权威文正公，既不正，更不公。例如他对那位著名政变专家、流氓军阀赵匡胤，不但拼命维护，而且一些历史罪过加以粉饰或隐没起来，突出的如赵匡胤，“玉斧一挥”，把“大渡以南以西”的大片国土信手掷掉，使云南、川西与西藏这片几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几十个“弱小民族”，同祖国隔离几百年而不顾。司马光这类大权威，就是如此对待历史的，屈原也就是这样被他们随便“揪”出史册了。

对待历史，对待古人，毛泽东同志倒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就是他对“四凶”之一的“共工”的肯定。他先把历史上的“诸说不同”一一列出来，然后再把自己赞成的《淮南子·天文训》一并举出，道出自己的结论：“共工是英雄、是胜利者，共工没有死”。相比之下，司马光未免太独裁，太霸道了！

“共工是确实胜利了。”用毛泽东这一历史观对待苗族史，应当说“三苗”也是胜利者，也是英雄。那些“尸骨如山”的蚩尤子孙们当然也“没有死”。苗族虽然没有用头撞倒不周山，使“天柱折，地维绝”，但是蚩尤的子子孙孙把千千万万个不周山和山下的大海永远踩在脚下。苗族在这种不畏山高水长的长征精神，正如苗族后裔屈原所描写的那样——“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勇于面对历史实际，并具有一颗火热同情心的外学者、专家们的肺腑之言——蚩尤子孙们遭遇到如此大幸而永远不灭的精神，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她不仅是中华民族史中一颗明珠，也是世界、人类史中极为宝贵